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十四集

诗卷

臧克家序

上海

文艺出版社

ZHONGGUO XINWENXUE DAXI

8588098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37—1949

In 20 volumes

VOLUME XIV: POETRY

Preface by Zang Ke-jia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90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十四集 诗卷

臧克家序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0,625 插页 6 字数 748,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0726-4/I·579

定价： 16.60元

序

臧克家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是伟大的十二年，也是充满了矛盾斗争、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二年！它，关系着民族的存亡，国运的盛衰，也对诗歌的动向与发展，起着导引与促进的重要作用。

这十二年，又分为截然不同的时期。前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终于获得胜利的八年；后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国统区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的四年。

抗战前期，全国诗人，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团结奋战，以笔作枪，精神乐观，斗志昂扬，诗情如潮，诗篇似海，街头诗、朗诵诗、抒情诗、叙事诗，……各呈异彩。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诗人们所在地区不同，情况因之迥异。身在解放区的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以欢腾的心情、高昂的斗志，写下了许多歌颂解放区人民为民族解放、为革命光辉前程而英勇奋斗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新的篇章。而在国统区的诗人们，鉴于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专政，发动内战，倒行逆施，形势险恶，情绪由高昂而变为沉郁。他们的满腔悲愤，以讽刺诗为突破口喷薄而出，如闪电，如惊雷，如匕首，如迫击炮，一齐向着黑暗的黑心轰击！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诗人们的情绪,就产生了情调不同的诗。

三十年代中期就以《大堰河》闻名于世的艾青,抗战时期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七七事变”后,诗人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行踪遍及半个中国,扩大了视野,把握到时代的脉搏。抗战前期,他向祖国和人民奉献出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旷野》、《火把》等诗集和长诗。《北方》收入了诗人抗战初期的重要短诗,它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表现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热情和信心;有时略带悲怆的诗句,正是作者感情深沉、热切的表露。作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向太阳》,是诗人的第一部长诗,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①,反映出抗战初期的热烈气氛。诗集《他死在第二次》中的《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②。长诗形象地描绘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热爱和对黎明的向往。这首诗,犹如飞着“血丝”的号角那样悲壮和庄严,作者在凝练的诗句中灌注着自己深沉的爱。长诗《火把》,歌颂了“群众的行动所发挥出来的集体的力量,群众本身所赋有的民主的精神”^③。诗篇接触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克服个人主义情调,转向伟大的革命集体主义的重大问题。《火把》是诗人的丰满热情与美丽理想开出的艺术花朵。

“皖南事变”后,艾青奔赴延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生活和创作进入到新的境界,洗刷了早期作品中的忧郁感。《黎明的通知》、《反法西斯》、《雪里钻》、《献给乡村的诗》等诗集,描绘了解放区的崭新生活,为工农兵而歌唱。诗人还站在雄伟的宝塔下,

①② 艾青:《为了胜利》。

③ 艾青:《关于〈火把〉》。

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发出了“黎明的通知”。

艾青的诗，较好地做到了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擅长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地抒写”；“他的诗歌富于丰满的形象与诗意”；“具有内在的旋律与整齐和谐的节奏”。“艾青的诗，标志着‘五四’以后自由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①

田间，一九三八年就到了延安，他也是这时期很有影响的诗人，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他的《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诗集，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侵略者复仇的坚强决心。《给战斗者》是他的代表作。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角，一同前进”^②。闻一多称赞田间的街头诗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③。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就是一首代表作。长诗《她也要杀人》^④，描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诗中的“她”，就是中国人民的化身。诗人在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身上，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这时期田间的诗，短促的、鼓点似的节奏，有力地配合了战斗的内容，一个个短行，犹如电光闪闪的战斗火花，给人以冲击和力量。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田间创作的《抗战诗抄》、长诗《戎冠秀》、《赶车传》（第一部），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新的探索。《抗战诗抄》中的“小叙事诗”，诗句凝练，描绘的场景和形象，颇精彩动人。《赶车传》采用民歌表现手法，描写贫农石不烂翻身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

① 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

② 田间：《写在〈给战斗者〉末页》。

③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④ 后改名为《她的歌》，收在《给战斗者》集中。

田间是“新时代的擂鼓者，新世界的战斗者，新诗歌艺术的探索者”，“在我国新诗的发展上有着不可轻视的艺术革新(或曰创新)的特殊意义”^①。

诗坛老将郭沫若，抗战一开始，就“别妇抛雏”离日回国。他高吟着“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投入战斗，主要是从事文化领导工作。抗战初期，他创作的诗集《战声》，充分表现了他的抗日救亡热情。诗中所表达的昂扬斗志和热烈情绪，与《女神》一脉相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反动腐朽的面目日益暴露，他的诗作也从歌颂、号召，转而为揭露、批判。收入《蜗塘集》的部分诗歌，抒写了这种情绪，如《罪恶的金字塔》、《进步赞》、《挽四八烈士歌》等篇。

老诗人柯仲平到延安较早。一九三八年创作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两首叙事长诗，歌颂了工农的英勇斗争，在表现形式上，吸收了民间歌谣的长处，是他的代表作。他写的短诗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

何其芳，《汉园集》作者之一，一九三八年奔赴延安。行前，他写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首诗，不仅呼唤昏睡的现实，也反映他自己的惊醒。到延安后，他“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开始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走了出来。……他的思想与诗风都为之一变”^②。这时期他创作的《夜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诗，收在《夜歌》^③诗集里。这些诗，表现了他的“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斗争，有的歌唱革命、青春和新的生活，也有的歌唱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汉园集》的另一作者卞之琳，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留延安期间，曾去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此行，使他产生了新

① 贺敬之：《田间诗文集·前言》。

② 周扬：《何其芳文集·序》。

③ 重印时，更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

的创作——《慰劳信集》。诗集中的二十首诗，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情绪乐观；艺术上也较以前朴素、平易。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经过抗战的洗礼，走出了“雨巷”。一九三九年，写了为祖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祝福的《元旦祝福》一诗。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被日寇逮捕，在狱中写下了一些光辉的诗篇。有的表现了他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如《狱中题壁》；有的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向往，如《我用残损的手掌》。艺术风格也随之变得明朗刚健、朴素自然。

老作家王统照，是以写小说闻名于世的，他也是诗人。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他创作了许多诗篇，集为《横吹集》、《江南曲》。其中《上海战歌》三首，格调悲壮，气势宏伟。《五月夜的星星》、《展一片绿野铺入青徐》等抒情诗，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深情。

二十年代就闻名于诗坛的冯至，在这时期也重执诗笔，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十四行集》，采用他所熟习的西方十四行诗形式，却“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①。诗写得很圆熟，在移植外来诗体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功的尝试。

“湖畔”诗人冯雪峰，抗战前长期从事左翼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在监狱里坚持斗争，以比较曲折的表达方式，用诗抒写了一个革命者战斗的、不屈的灵魂。这些诗篇，集为《真实之歌》和《灵山歌》，给读者以鼓舞和力量。

光未然（张光年），以写歌词和朗诵诗闻名。抗战前夕，就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歌词《五月的鲜花》。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组诗《黄河大合唱》。这组气势磅礴、雄健浑厚的英雄诗篇，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相得益彰。“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像风暴中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

^① 冯至：《诗文自选琐记》。

魄。”^①一九四〇年他在重庆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屈原》，亦有相当影响。

高兰，有“朗诵诗人”之称。抗战初期，出版有《高兰朗诵诗集》，其中《我们的祭礼》、《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等诗篇，取得相当好的朗诵效果。《哭亡女苏菲》是他的名作，感情真挚、悲痛，感人至深。

方扬，在这时期出版了《我的竖琴》及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射虎者及其家族》以悲愤的激情、朴素有力的诗句，谱写出了旧中国农村中射虎者一族的“悲歌”，及其子孙们“那永远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属于整个被压迫阶级的。这首长诗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当时活跃在大后方的，还有原中国诗歌会的诗人和其他诗人，如王亚平、穆木天、蒲风、任钧、柳倩、臧云远、方殷、方敬、吕剑、徐迟等。其中王亚平出版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火雾》等五部诗集。他的《血的斗笠》、《塑像》等诗篇，表现了抗日战士的英勇，抒发了作者炽热的爱国激情。

由文学理论家、诗人胡风主编的，先后于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创刊的《七月》、《希望》文学杂志及《七月诗丛》，拥有一批诗作者，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作者除艾青、田间外，还有鲁藜、绿原、邹荻帆、冀沅、亦门(SM、阿垅)、孙铤、天蓝、曾卓、庄涌、彭燕郊、牛汉、化铁、艾漠(贺敬之)等。他们当时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奔赴前线，有的留在后方。他们的作品从不同方面表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斗争，发扬了诗的现实主义传统，肯定和继承了自由诗体的形式，又注意“主客观的高度一致，包括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②。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

① 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

② 绿原：《〈白色花〉序》。

响的流派——“七月诗派”。他们的诗作，有些由胡风主编，选入《七月诗丛》，其中有胡风的《为祖国而歌》、亦门的《无弦琴》、冀访的《跃动的夜》、庄涌的《突围令》、孙铤的《旗》等等。各人还出版有数量不等的诗集。

鲁藜的诗集有《醒来的时候》、《锻炼》、《星的歌》。他的诗，青春气息很浓。代表作《泥土》，颂扬了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红的雪花》，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

绿原的诗集有《童话》、《又是一个起点》、《集合》等。《童话》中的诗，浪漫主义气息较重；后两部诗集里的作品，冷峻、坚毅，敢于直面人生。

邹荻帆出版有《木厂》、《青空与林》、《意志的赌徒》、《雪与村庄》、《跨过》和政治讽刺诗《恶梦备忘录》等多部诗集。

三十年代初期以《烙印》、《罪恶的黑手》等诗集引起诗坛瞩目的臧克家，抗战一开始，就引吭高歌，奔赴前方达五年之久。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从军行》、《淮上吟》、《古树的花朵》等长短诗集六部。诗篇热烈地歌颂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兵车向前方开》等诗篇，洋溢着乐观情绪和战斗激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现实使他把笔锋转向他所熟悉的农村，创作了与《烙印》一脉相承的《泥土的歌》，其中《三代》、《春鸟》是代表作。在《春鸟》一诗中，作者通过诗人与春鸟的反差对比，揭露了黑暗现实，抒发了诗人向往自由、渴求真理的心情。

一九四二年秋，诗人从前方到了山城重庆。抗战胜利前后，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死活，依仗美帝发动内战，便以愤怒的、火样的激情，把笔尖“刺向黑暗的‘黑心’”，写下了《胜利风》、《宝贝儿》、《枪筒子还在发烧》、《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生命的零度》等大量政治讽刺诗，收在《宝贝儿》、《生命的零度》两个集子里。他在《枪筒子还在发烧》一诗的最后两节中写道：“大破坏，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大离散，还嫌离散得不

够惨?/枪筒子还在发烧,/你们又接上了火!/和平、幸福、希望,/什么都完结,/人人不要它,它却来了——/内战!”臧克家的讽刺诗,大部分是对国民党的揭露、控诉、斥责。评论家张光年说:“这些诗表达了一个革命诗人的正气和大无畏精神,并且满怀信心地迎接‘一个奇怪的变’。”^①

由于臧克家深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在诗的风格上,早期作品严谨、含蓄、精练。这时期,诗人视野开阔了,诗风也变得奔放流畅;为了发挥政治讽刺诗的社会效益,诗的语言就更加朴素、自然了。

袁水拍,是解放战争时期很有影响的诗人。抗战前期,他出版了抒情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其中《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颇有名,诗人从对苏联人民的歌颂中,寄托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与期望。抗战后期开始,诗人面对黑暗现实,善于从政治上把市民阶层里某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现象,用漫画式的手法和讽刺语言予以鞭挞,寓讽刺于叙事之中;并汲取民歌、民谣、儿歌中的艺术经验,采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用马凡陀的笔名,写了大量政治讽刺诗,集成《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续集”,影响很大。其中《主人要辞职》、《一只猫》、《发票贴在印花上》、《这个世界倒了颠》等讽刺诗,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依靠美帝发动内战的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②;“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③。在上海,我亲眼看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队伍高唱着《山歌》奋勇前进。《山歌》对当时的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山歌》政治性很强,但不是标语口号式的,由于作者的努力创新,它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也取得了

① 张光年,《欢呼集》序。

② 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

③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好效果。这期间，袁水拍还出版了抒情诗集《在沸腾的岁月里》。

四十年代后期，有一批中青年诗人在上海诗歌刊物上发表诗作，他们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他们忧时愤世，向往光明，采用欧美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写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和斗争精神的作品，如辛笛的《布谷》、陈敬容的《力的前奏》、杭约赫的《最后的演出》等诗篇。陈敬容的《力的前奏》，预感到了革命风暴的必然来临。女诗人从自然界的律动，领悟到阶级斗争的风雷。他们之中个别人的诗，比较晦涩，使作品的社会效果受到影响。

当时常在上海或全国报刊发表诗作的，还有苏金伞、沙鸥、青勃、田地、康定、鸥外鸥、韩北屏等；内蒙的纳·赛音朝克图，在香港的黄宁婴，也写了不少诗。这些诗人，各自有个人的风格，像诗的天空中一颗颗闪光的星星。

解放区的诗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延安文艺整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亲身参加群众变革现实的火热斗争，使思想感情和文艺观起了根本的变化，作品面貌为之一新。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等等作品里，可以闻到扑鼻的芳香，它们像早晨阳光下闪耀的露珠，像新春园圃里初放的花朵。

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作于一九四五年年底。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在三边收集民歌近三千首。《王贵与李香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涌现的优秀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与革命斗争胜利的血肉关系，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纯朴的爱情。近千行的长诗，全部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灵活运用比兴手法，写景抒情，塑造人物，节奏明快流畅，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音乐性，使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民族形式达到较好的统一。在诗歌的民族化、群众

化方面,开辟了新的途径。一九四六年九月,诗作一发表,就吸引了读者。陆定一当时就写文认为,《王贵与李香香》从内容到形式都“出来了新的一套”,“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郭沫若为《王贵与李香香》作序,称赞它是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

阮章竞一九四七年创作长篇叙事诗《圈套》后,又于一九四九年完成了有名的《漳河水》。这是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用民歌形式写成的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叙事诗,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长诗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和社会习俗、思想意识的转变与政治经济变革的关系紧密相连在一起,塑造出三个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作者把流传在漳河两岸的谣曲加以改造,并吸取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写出了这部朴实与华美、明丽与清新、刚健与柔婉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张志民作于一九四七年的《王九诉苦》以及《死不着》等叙事长诗,反映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压迫下的悲惨生活,歌颂他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得到了翻身解放。《王九诉苦》这首长诗,朴实流畅,不枝不蔓,用粗线条勾勒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一发表,就受到热烈的称赞。

当年,活跃在延安、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诗人,还有贺敬之、严辰、李冰、魏巍、邵子南、曼晴、方冰等。其中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诗人陈辉是很有才华的,可惜一九四四年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了,年仅二十四岁。他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用满腔热情去歌唱革命战争。由田间整理出版的《十月的歌》,只是他的一部分遗诗。他的诗刚健朴实,瑰丽浑厚,诗风粗犷、激越、清新、自然,充满战斗气息。其中歌颂晋察冀的《献诗——为伊甸园而歌》及《为祖国而歌》两首,尤为感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蓬勃发展,数量丰富,形式多样。农民李有源的《移民歌》(后经文艺工作者加工整理,

成为著名的《东方红》)、战士毕革飞的快板诗《“运输队长”蒋介石》，影响最大。

二

与前两个十年相比，这十二年来的诗歌创作是有着明显的特点的：

1. 时代的主旋律更加突出、响亮。

时代的主旋律，凝聚着这一时代的重大斗争，反映着绝大多数群众的向往与精神面貌，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这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自然成为诗人们写作的主题，诗歌在斗争中起了冲锋号的作用，以它突出而响亮的主旋律，鲜明而光荣地写在中国新诗史上。这，成为它与“五四”时代、三十年代初期诗歌创作不同的主要标志。“五四”时期的文学，总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但当时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口号，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作家写作目的的朦胧性和不自觉性。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左翼诗人，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创作红色鼓动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超前性，和我国当时的国情不尽洽和。而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在内容上突出了时代的主要矛盾，诗人与时代靠近，与人民贴心，他们反映时代主旋律的诗作，将在中国新诗史上永放光芒。当然，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采的，各个诗人的文艺观和经历不同，因此，围绕时代主旋律的诗歌创作，也是千姿百态的。

2. 对新诗品种，诗体的开拓和探索。

这时期的诗歌不仅主旋律突出，而且品种、诗体多样。抗战初期，街头诗、朗诵诗风行。诗人们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深入农村、部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诗人写的标语就是街头诗，如“田地不能挑起逃，要和鬼子干一

遭”。当时，田间是街头诗的积极倡导者，他自己就写了不少风行一时的街头诗。为了让诗歌面向群众，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朗诵诗应运而生。战前，中国诗歌会曾提倡过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但较多地限于理论上的探讨。抗战初期，冯乃超在武汉穆木天、锡金创办的《时调》创刊号上发表《宣言》：“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高兰、光未然都写过质量较高的朗诵诗，他们和徐迟是诗歌朗诵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诗歌朗诵运动首先在武汉兴起，继而推及到延安、重庆、桂林等地；抗战后期，在昆明，闻一多、朱自清都积极参加过诗朗诵。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在扩大诗歌的影响，推动诗歌大众化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普及到群众中去。

叙事长诗的丰收，是这时期诗歌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者除艾青、田间、柯仲平、力扬、臧克家、李季、阮章竞、张志民……外，写小说的老舍，这时也用大鼓调写了叙事长诗《剑北篇》，有一定特色。前两个十年，虽然也产生过长篇叙事诗，但数量不多，高质量的作品少。茅盾认为，诗歌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虽然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①。

政治讽刺诗的勃然兴起，也是这时期新诗品种、诗体的一个开拓与发展。政治讽刺诗，是向往光明的诗人们面对黑暗现实而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火花。“五四”以来，白话讽刺诗的创作是一个薄弱环节。“左联”时期，曾出版过讽刺诗集，但成绩不太显著。这时期的政治讽刺诗，做到了叙事与抒情结合，形象描绘与政论说理结合，内容与形式都有所创新。特别是《马凡陀的山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十二年来，新诗创作在诗体上，既有自由诗，也有格律诗、楼梯

① 茅盾：《叙事诗的前途》。

式诗；既有在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富有民族形式的新诗风格，也有采用外来形式，探索使之中国化的尝试。诗人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为新诗体的建设纵横驰骋，大胆创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我完全同意茅盾在《为诗人们打气》一文中，对诗人们在这一时期，在努力开拓新诗品种和诗体方面所作的探索的高度评价：“他们大胆地作了朗诵运动，大胆地作了街头诗运动，大胆地采用了民谣的风格，大胆地写长诗……，他们这种大胆地尝试，勇敢地创造的精神，我们一定要珍视，一定要赞美。”

3. 向民族化方向迈进。

“五四”以来的新诗运动，对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抗战期间，开展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诗人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同样是创造新诗的民族形式的正确方向。他们在深入群众中，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又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生活和艺术爱好，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与尝试。

有些诗人企图通过加重新诗的传统色彩，使新诗步入工农兵的行列。如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老舍的《剑北篇》，在利用旧形式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但效果不很理想。老舍自己承认《剑北篇》“旧的成份太重了”。何其芳在肯定柯仲平成就的同时，指出其缺点是“不现代化”，一部分旧形式“利用得不适当”。这说明，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应当是：使旧形式现代化，与新诗融为一体。

有的诗人，为了丰富新诗的表现技巧，采用外来形式或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艺术手法。实践证明，凡是能联系中国实际而加以消化的，便取得了成绩；欧化太重，晦涩反俗，就遭到非议。

要使新诗民族化、大众化取得丰硕的成果，诗人必须深入实

际,熟悉群众,掌握旧形式,在诗人与群众结合的基础上,在新诗与民歌结合的基础上,对旧形式加以改造创新,使之适合于表现新人物的生活和斗争。李季、阮章竞等诗人的成功的创作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决非一途,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但总的原则应当是:诗人深入实际,表现时代生活;继承传统,使旧形式现代化;汲取外国营养;让外来形式中国化。

这部《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诗卷》,选入了一百九十五位诗人、三百九十一首诗,这是从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千百万首诗歌中选出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诗歌也作出了无愧于时代和祖国的卓越贡献,给中国新诗史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一章。今天回顾一下这十二年来诗歌创作的情况,一方面感到鼓舞和欣慰,一方面又觉得光芒四射、为诗史增辉的大作,还不够多。抗战时期,诗人即兴成篇的多,锤炼之功稍差,有些作品显得比较草率,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讽刺诗在反映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反抗黑暗现实的志愿与实践方面,显得不太够;这与当时环境的局限和诗人深入生活不够有关。我们要通过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诗篇。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诗卷

臧克家序